



Beisong Shidafu de Zhengzhi Lixiang he Shijian
— Yi Beisong Qianzhongqi Weizhongxin de Yanjiu

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实践

——以北宋前中期为中心的研究

李同乐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Beisong Shidafu de Zhengzhi Lixiang he Shijian
— Yi Beisong Qianzhongqi Weizhongxin de Yanjiu

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实践
——以北宋前中期为中心的研究

李同乐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实践:以北宋前中期为中心的
研究 / 李同乐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308-14479-7

I. ①北… II. ①李…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
北宋 IV. ①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0691 号

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实践
——以北宋前中期为中心的研究
李同乐 著

责任编辑 胡 畔(lpp_lp@163.com)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479-7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已有的相关研究	3
一、关于文化与政治之关系的研究	3
二、关于政治结构和政治活动方面的研究	6
三、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	9
四、对于士大夫群体的研究	12
五、对宋代士大夫主体精神的研究	12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构成	14
一、本书的研究方法	14
二、本书的内容构成	15
第一章 转型与成长:北宋初期的士大夫	17
第一节 从唐末到宋初:士大夫的角色变化	17
一、唐宋之际士大夫社会身份的变化	21
二、五代宋初士大夫的角色转型	24
第二节 北宋“重文”的国策	35
一、太祖:基调的奠定者	36

二、太宗:观念的转变	43
三、真宗:守文的君主	50
第三节 宋初士大夫“行道”意识的复兴	52
一、徐铉与辛仲甫:以行道为己任的先行者	53
二、柳开:最早的古文家和古道的倡导者	56
三、张齐贤与田锡:志于“致君”的宰相和谏官	59
四、王禹偁和孙何:以文行道的后继者	61
五、张咏与种放:名臣与名隐的抱负	66
小 结	71
第二章 走向成熟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政治	72
第一节 士大夫群体的壮大与士大夫政治的成熟	72
一、士大夫群体的壮大	72
二、“共治”局面的定型和士大夫“致君”意识的普遍形成	82
第二节 庆历兴学与科举改革:“士”的培养与选拔	89
一、仁宗时期士大夫振兴学校教育的努力	89
二、科举考试的改革	103
第三节 大中之道与三代之制:士大夫的政治理念与制度设计	119
一、大中之道:三代之治的最高原则	120
二、三代之制:理想与变通	127
三、《周礼》:变革的蓝图	133
第四节 君子之朋:士大夫的联合与斗争	145
一、“君子有党”的提出	145
二、“伏阁”:士大夫的首度联合	148
三、景祐党争:“君子之党”的出现	151
四、庆历新政中的士大夫联合	157
小 结	163

第三章 变法与反变法:在不同的理想之间	165
第一节 变法:士大夫“行道”的机遇	165
一、神宗与王安石的君臣际会	165
二、尧舜之道:王安石和神宗合作的思想基础	174
第二节 经术所以经世务:学术对政治的影响	181
一、濮议:皇考派在“义理”上的胜利	181
二、王安石通过经筵影响皇帝和推行变法	189
三、王安石依托《周礼》推行新法	197
第三节 “一道德”:科举教育的再次改革	200
一、王安石关于人才培养的思想	200
二、改革教育科举制度的具体措施	207
第四节 道不同: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220
一、因循派的政治理念	221
二、司马光的主张	226
三、代表理学家主张的二程	238
第五节 英、神两朝士大夫的政治斗争	245
一、濮议:与礼法之争相伴的政治对立	246
二、“共治”与“得君”:王安石对其他士大夫的压制	251
小 结	259
第四章 北宋后期:“致君尧舜”的式微	261
第一节 “更化”与“绍述”:政治路线的反复	261
一、更化:新法反对派的上台及其目标的实现	261
二、绍圣:再定国是	273
第二节 从党争到党祸:北宋士大夫的分裂	277
一、反对派与变法派的斗争	277
二、反对派的内部分化	281
小 结	282

结 语	283
参考文献	288
一、古代史籍	288
二、今人论著	292
索 引	296

引 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士大夫一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文化生活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士大夫阶层和士大夫政治有着自身发展演变的历程，秦汉以后官僚制取代世袭制，士大夫成为国家文官系统中的主体，到了唐宋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和完善，士大夫已经渗透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机构当中，广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以现代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士大夫实际上具有双重身份，即一方面参与政治生活，是政府的官员；另一方面又从事对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再创造，在中国古代文化领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学者—官员”或者“儒生—官员”成为对秦汉以后的古代士大夫的现代表述。

宋代士大夫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典范。宋代实行“以文治国”的政策，由于统治者的提倡，整个朝廷和社会都形成了“重文”的氛围，加之科举取士的数目大大超过前代，所以很快造就了一支庞大的文官队伍。与此同时，这些科举入仕的官员也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影响巨大的士大夫阶层。士大夫的活动深刻影响了有宋一代的面貌，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非凡创造将宋代推向了古代文化史上的巅峰，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

赵宋之世。”^①

更重要的在于，在宋代士大夫身上体现了强烈的士大夫精神，即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与担当意识。这其中又以北宋士大夫表现最为突出，北宋名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语，发出了这一时期士大夫的最强音。

然而，当我们关注于北宋士大夫身上所体现的这种强烈的责任意识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责任意识究竟根源于何处，为何这种意识在宋代士大夫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宋代士大夫又是如何将这种意识灌注到自身的政治活动中，将忧国忧民之情转化为政治实践的？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我们对于宋代士大夫的关注才不会仅仅限于敬仰与感叹，从而能够对历史上这些真实存在过的、有着光辉形象的群体给予更多深入、细致的了解。做这样一番考察，不仅有着对既往历史研究的意义，对于当今时代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书的写作，正是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解释。本书所要考察的对象，就是北宋的士大夫群体。考察所涉及的，将主要集中在士大夫群体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活动两个方面，并特别侧重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之所以选取这样的视角，正是由于士大夫集双重角色于一体，他们源于文化传统而形成的政治观念与他们的政治活动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所以，对于士大夫的考察不能从单一维度进行，只有给予双重关照才能获得对北宋士大夫的活动的深入理解。通过本书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北宋士大夫的政治责任感正是来源于儒家传统中致君尧舜、实现“三代”之治的理想，他们在实践领域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也是以此为精神动力和理论来源的。由此观之，对士大夫的文化角色和政治角色的考察不能孤立地展开。如果要对本书的研究视角做一技术性的概括的话，那么这种表述不仅是着眼于儒学复兴背景下士大夫之观念与实践的互动的考察，亦可视为基于文化史与政治史相互关系的考察。在这一点上，与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中所采用的方法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45 页。

是比较接近的。

在时间范围上,本书的考察包括整个北宋时期,但是以北宋前期和中期为主,具体而言是以北宋建立到王安石变法结束的这段时期为主要时段,这是由于这段时期正是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由兴起到高潮的阶段,故而最具有代表性。

第二节 已有的相关研究

以现代史学方法对宋史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了,在近 80 年的时间里,研究领域涉及宋代历史的方方面面,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对宋代士大夫的研究虽然是近 20 年才兴起的,但也成果颇丰,除了一系列专著面世,更有数量可观的论文发表,研究领域也涉及了与士大夫相关的各个方面,如政治结构、人格特点、文化心理、经济生活、社会观念、思想学术、士风、重要人物、家族、年谱等等。研究角度不可谓不全面,涉及学科亦不可谓不广泛。由于本书的研究是侧重于士大夫群体的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两个方面及其互动,故而没有必要对这些成果一一列举,只选择与本书论题相关者概述如下。^①

一、关于文化与政治之关系的研究

上面已经提到,本书所进行的是着眼于士大夫的观念与活动的关系,亦即文化与政治之相互关系的研究,故而应该对于以该视角展开的研究首先进行一番梳理。

刘复生的《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一书,^②以唐宋儒学复兴运动为背景,除

^① 对于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关于宋代士大夫的研究情况,可参看马斗成、王滨《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 2 期。另外,杨世利的《近二十年来宋代士大夫政治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 年第 4 期),对近二十年来有关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日本学者真锅多嘉子的《近十五年来日本对宋代士大夫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 年第 8 期)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总结。

^② 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天津出版社 1991 年版。

了考察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生和特点、对待佛老的态度、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和对史学的影响外,还论及了儒学复兴对政风变化和政治革新运动的关系、与兴学运动和科举改革的关系。该书是着眼于儒学思潮对社会政治文化诸方面之影响的宏观研究,文化与政治活动只是所讨论的问题的一个方面。此外,虽然士大夫的活动包含于其中,但该书并非是以士大夫群体为对象的研究。

阎步克教授所著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①对从先秦到东汉这一历史时期内“士大夫政治”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该书以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为基本视角和出发点,以学士和文吏的分合为中心问题和主要线索,对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的出现及其文化传统,以及进入帝国时代后士大夫的政治和文化角色的演变都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且指出源于上古的、具有身份二重性和功能弥散性的封建士大夫,在经历了秦汉之际的角色分离后,至东汉再度以学士和文吏的融合而最终定型为士大夫政治。该书虽然并不以宋代士大夫为研究对象,但是其“学士”和“文吏”的二维视角为理解宋代士大夫和士大夫政治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在该书的推论部分也对东汉以后的士大夫政治进行了鸟瞰式的阐发。

关长龙的《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一书,^②对宋代道学兴起后道学士大夫在两宋的政治实践和道学所受的政治影响进行了考察,揭示了道学在两宋经历的命运变迁。该书并未将道学士大夫仅仅限于理学家,而是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使用“道学”概念,一些具有道学思维的士大夫如王安石和元祐派都被纳入考察范围。该书亦是基于文化和政治之关系的考察。不过,尽管作者使用的“道学”意义较为宽泛,打破了朱熹描述的以“五子”开端的北宋道统谱系,但该书关注的仍然是以“道”为核心的学术思想的流变,以北宋中期庆历、熙宁之际论道之风兴起为研究时段的起点。这样一来,作者的研究对象就不是“士大夫群体”,而是“具有道学思想的士大夫群体”,对于此范围之外的儒家士大夫以及北宋前期的士大夫的研究并未涉及。

①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①集结了12篇对中国古代的“士”的研究专论。在这些文章里，“士”主要被理解为“知识分子”，并侧重于他们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之考察。其中《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概论——〈朱子文集〉序》对朱熹生活时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进行了概述。而他的另一部著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②则是以文化史和政治史的互动为视角研究宋代士大夫之政治文化的代表性著作。作者考察了文化史在儒学的复兴及其演进，政治史在改革活动中所显现的权力结构与动作方式，并且注意到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这两个系列的发展是交织在一起而不可能清楚分开的，二者统摄在士大夫的整体活动之中。余英时认为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至少他们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清。此外，该书将北宋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之变迁作为更加广阔的背景进行了叙述，涉及范围实际上已经囊括了两宋时期。不过，该著作所关注的“士大夫”群体主要是理学家，其关注的“文化”也主要是理学文化，且在时间范围上主要集中在南宋特别是朱熹的生活时期。对于北宋时期特别是北宋前期士大夫的思想和活动，以及理学产生之前的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虽然有所涉及，但并没有当作主要问题详细展开，而只是将其作为背景化的描述。

邓小南教授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书，^③主要考察了从五代宋初到北宋仁宗这一历史时期内“祖宗之法”的形成过程，并对此后一直到南宋后期“祖宗家法”的政治影响进行了概览。作者将“祖宗家法”处理为以“事为之制、曲为之防”为核心精神，并包括一系列具体“做法”和各种“说法”的综合体。该书虽并不以宋代士大夫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是对宋代士大夫在“祖宗之法”的建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都做了细致描述，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宋代士大夫在宋代政治中的地位 and 影响，并且揭示出了宋代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复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③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杂互动的关系。^①

此外,吴晓萍《苏辙的变法思想及其实践》一文^②,指出苏辙提出的变法主张不像苏轼那样保守,又不像王安石那样偏激,在某种程度上更深刻和合理。李馥明《宋代“二程”的国家忧患意识及其对时代的回应》一文,^③指出程颐程颢兄弟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创立新儒学,这是对时代挑战的积极回应。王启发《在经典与政治之间》一文,^④认为王安石的“新法”与“新学”之间的联系不仅通过其对《周礼》的认识和解说得到体现,更与王安石本人的“先王”意识及古典理想主义结合起来。这些论文都是将文化与政治结合起来所做的研究。由于这些都是个案研究,所以一方面不能反映士大夫的群体面貌,另一方面不能揭示一段时期内思想与政治互动的发展轨迹。

二、关于政治结构和政治活动方面的研究

宋代士大夫在政治结构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以至于有“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人治国”的士大夫政治。对于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研究,首先不能脱离对于宋代政治结构的考察,而士大夫与皇权之关系又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士大夫与皇权关系方面,早在20世纪40年代,张荫麟就发表《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⑤对太祖誓碑和政事堂刻石二事进行考辨,认为二者皆不可信。今人杜文玉的《宋太祖誓碑质疑》,^⑥通过考辨认为誓碑之事是根本不存在的。程民生的《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

① 这里所说的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加以理解:一是“祖宗家法”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与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二是士大夫在“祖宗之法”的建构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与政治的关系。

② 吴晓萍:《苏辙的变法思想及其实践》,《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③ 李馥明:《宋代“二程”的国家忧患意识及其对时代的回应》,《洛阳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④ 王启发:《在经典与政治之间》,《湖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⑤ 张荫麟:《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文史杂志》1941年第1卷第7期。

⑥ 杜文玉:《宋太祖誓碑质疑》,《河南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制》，^①认为宋代士大夫通过言事、劝谏、封驳、神权、舆论和经筵等手段限制皇权，体现了历史进步。张其凡的《宋初中书事权初探》一文，^②通过对宋初的中书与枢密院之关系的对比，以及对参知政事之职权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宋初的中书之权不是削弱而是增强了。另外一篇《三司·台谏·中书事权——宋初中书事权再探》，^③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与三司之关系的考察，并指出在宋初三朝，中书可谓事无不统，涉及军事、民政、刑罚、财政诸多方面。此外，他的《北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略说》^④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⑤，认为皇权、相权和台谏之权三者相互制约又相互依恃，形成共治架构。

在对士大夫政治的考察方面，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成因探析》^⑥、《士与官僚的合流——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⑦两篇文章，深入探究了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确立的原因和过程。张学玲《北宋士大夫及士大夫政治》一文，^⑧对士大夫政治的成因及士大夫们表现出的精神文化风貌进行了考察。陈峰《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一文，^⑨认为宋代重文抑武的国策提高了文人的地位并激发了士大夫的政治热情。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对宋

①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② 张其凡：《宋初中书事权初探》，收入氏著《宋初政治探研》卷1，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3页。

③ 张其凡：《三司·台谏·中书事权——宋初中书事权再探》，收入氏著《宋初政治探研》卷1，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1页。

④ 张其凡：《北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略说》，收入氏著《宋初政治探研》卷1，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7页。

⑤ 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暨南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⑥ 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成因探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⑦ 郭学信：《士与官僚的合流——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⑧ 张学玲：《北宋士大夫及士大夫政治》，《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⑨ 陈峰：《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

代士大夫政治持消极看法,如李峰的《论北宋“不杀士大夫”》一文,^①认为不杀士大夫是一条伪家法,事实上败坏了宋代的政风。冯小琴《试析北宋士人“治世”才能缺乏的原因》一文,^②认为宋代政治环境压制了士大夫的政治才能,优裕的生活消磨了士人的才华。贾海涛《北宋政治的得失与“儒术治国”的尴尬》一文,^③认为北宋堪称“儒术治国”的典型,然而整个北宋一直国势不振并最后败亡,这使“儒术治国”说陷入真正的尴尬。

宋代士大夫广泛参与政治并出现“共治天下”的局面,除了统治者确立的“重文轻武”的国策以外,还有一系列制度的保证。宋代科举发达,科举考试成为读书人入仕的最重要的途径,祝尚书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一书,^④涉及了宋代科举发解、省试和殿试制度,糊名考校制度以及考试科目与考试内容。邓小南教授的《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⑤对宋代文官的选拔和任命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文官制度、铨选部门、考课之法、选拔资格等等,进行了详细考察。与此相关的是游彪的《宋代荫补制度研究》^⑥,则是对宋代入仕途径之一的“荫补”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诸葛忆兵的《宋代宰辅制度研究》,^⑦对宋代宰辅制度之渊源、三省制度、相权强化、宰相职权、宰辅机构设置以及与台谏之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虞云国的《宋代台谏制度研究》,^⑧在对宋代台谏制度本身进行系统考察的同时,还将之与西方的权力制衡制度进行了对比,对中国古代的分权制衡进行了深入思考。陈元锋的《宋代馆职的名实与任职》一文,^⑨将宋代馆职从职能上分为狭义的馆职和贴职两类,并对各自的相关制度进行了分析。

① 李峰:《论北宋“不杀士大夫”》,《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

② 冯小琴:《试析北宋士人“治世”才能缺乏的原因》,《兰州铁道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③ 贾海涛:《北宋政治的得失与“儒术治国”的尴尬》,《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

④ 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⑤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⑥ 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⑦ 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⑧ 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⑨ 陈元锋:《宋代馆职的名实与任职》,《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

对北宋士大夫政治活动的考察,则主要集中在改革和党争两个方面。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是北宋士大夫掀起的两次革新浪潮,也是北宋士大夫最为重要的政治活动。对于这两次改革活动的研究情况,已经有专门的总结概述,此处不再赘述。^①关于宋代党争方面,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一书,^②分析了太平兴国三年的进士之间的交游及政治关系,并以此出发来考察宋初朋党的特点。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一书,^③把握住了宋代士大夫集文人、学者、官员三种身份于一身的特点,以此出发揭示了北宋士大夫在党争中表现出来的特点以及对学术与文学造成的影响。其续篇《南宋文人与党争》,^④对南宋150多年中延续不断的党争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将党争视为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以及文化活动中的轴心。此外,沈松勤《北宋台谏制度与党争》一文,^⑤认为党争激发了台谏固有的性能与作用,反过来又激化和毒化了党争,从而加速了北宋政治的衰败,也损害了文学和学术等文化发展。

三、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

唐宋之际是社会历史的大变革时期,也是儒学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宋代,儒学的新形态——理学——得以形成,实现了儒学复兴的目标。作为学者的宋代士大夫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了推动儒学发展的过程之中,而他们在文化思想方面的活动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政治方面,所以对于宋代士大夫在文化领域的活动的考察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关于宋代士大夫对于理学体系的理论建构,因其属于哲学史研究的范畴,故而在此不加以梳理。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于思想史和文化史领域的演变情

① 参看《宋史研究》第二章之“受现实政治影响最大的研究课题——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范仲淹及其庆历新政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 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1994年版。

③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④ 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⑤ 沈松勤:《北宋台谏制度与党争》,《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况。美国汉学家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①以唐宋变革为历史背景，在考察了唐宋士人社会身份经过了门阀士族——文官——地方精英的变化后，以“斯文”为核心概念，并围绕士人对于“学”的态度变化以及“学”之内涵由文化向伦理的演变，揭示出了唐宋士人价值观的变化轨迹。作者并不把道学之产生看作是必然的结果，有助于我们把握唐宋的思想转型和道学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该书虽然采用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但主要是以文学史和思想史为视角展开研究。此外，刘复生的《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也考察了儒学复兴运动的发生发展，以及对史学、政治、教育和科举方面的影响，并将理学看作儒学复兴的最终产物。

在论文方面，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的兴起及其特点》一文，^②以唐宋社会变革为历史背景，梳理了历史上的疑经思潮来揭示出现于北宋中期的“学统四起”的儒学复兴并揭示出了这次儒学复兴表现出来的三个特点：坚持儒家道统、把握六经精神、提倡经世致用。郭学信《略论北宋儒家士大夫在儒学复兴中的贡献》^③，指出北宋儒家士大夫在儒学复兴中张扬了儒家价值系统中“积极有为”的“道”，把儒家学说义理化、人文化，重建儒家知识系统的“学”，为儒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增添了活力。李存山《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④详细梳理了范仲淹在宋代儒学复兴过程中的活动，高度评价了他在宋代学术教育方面的贡献。王国良、郭蕾《欧阳修与北宋儒学复兴运动》，^⑤指出欧阳修在北宋儒学复兴过程中三个方面的贡献，即提倡“文道合一”；提倡破除训诂、阐扬义理；攘斥佛老，促进儒家人文礼义的复兴。高建立《论宋初三先生对宋明理学的

① [美]包弼德著：《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的兴起及其特点》，《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③ 郭学信：《略论北宋儒家士大夫在儒学复兴中的贡献》，《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④ 李存山：《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

⑤ 王国良、郭蕾：《欧阳修与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